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

# 中国民族地理

潘玉君 伊继东 孙俊 等著



科学出版社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

# 中国民族地理

潘玉君 伊继东 孙俊等著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项目  
云南省高校潘玉君名师工作室  
民族教育信息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成果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家“九五”重点图书项目。书中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系统阐述了中国民族地理问题。全书共8篇67章和附录。其中，整体的民族地理研究分布在第一、二两篇，论述了民族的人种及其地域结构、民族起源与演进的时空格局、民族演进的地理基础以及民族空间格局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56个民族地理的研究分布在第三至六篇，详细阐明了民族渊源的历史地理、体质人类学特征、社会文化地理（语言、文字、服饰、习俗、饮食、民居、信仰等）、人口地理等。跨地域的民族地理研究，主要包括华侨华人地理和跨界民族地理，分布在第七篇的两章中。回顾了华侨华人的形成及其现代分布，介绍了华侨华人聚落及其文化景观唐人街；跨界民族的形成历史，跨界民族结构及其跨界史等。民族地理分区和民族地区发展，分布在第八篇的两章中。给出了中国民族地理分区综合方案，详细分析了每个民族大区的民族结构、社会文化结构等；论述了民族地区的地理特征与经济发展，应用多种指标测度了民族地区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本书是国内外第一部从地理学角度系统阐述中国民族地理的学术著作。可供有关专家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参考，可作为地理学、民族学等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生教材。

审图号：GS (2014) 2565 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吴传钧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4

ISBN 978-7-03-048209-9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人文地理学—中国 IV. ①K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4604

责任编辑：吴三保等 / 责任校对：刘小梅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黄华斌 陈 敬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4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6 1/2

字数：860 000

定价：3680.00 元（共12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第二届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陆大道 陈宗兴 王恩涌 钱今昔 李润田  
邬翊光 李文彦 余之祥 许学强 毛汉英  
邹逸麟 周一星

主 编 郭来喜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创琳 (常务) 刘 毅 吴三保 (执行)  
沈道齐 张国友 李 锋 陆玉麒 周尚意  
林 鹏 保继刚 顾朝林 樊 杰 潘玉君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金宏 王兴中 王 铮 冯德显 宁越敏  
刘卫东 刘君德 刘彦随 刘沛林 孙峰华  
朱 竑 朱海燕 吴楚材 张小林 张小雷  
张文尝 张平宇 张虹鸥 张 捷 张善余  
张耀光 李九全 李小建 杜德斌 杨开忠  
杨永春 沈伟烈 陈 田 陈 雯 周春山  
罗 静 金凤君 修春亮 姚岁寒 赵 媛  
柴彦威 高 峻 彭 斌 曾 刚 韩增林  
路 紫 薛德升

学术秘书 冯 健 马海涛 张 莉

## 《中国民族地理》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吴传钧 郭来喜 王恩涌 吴三保 张国友

何耀华 伍雄武 戴庆夏

主 编 潘玉君 伊继东

副主编 孙 俊 (常务) 赫维人 姚 辉 武友德

明庆忠 起国庆 骆华松 周本贞 陈 颖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文荣 丁 生 王文静 王声跃 甘健侯

陈 华 陈 旭 陈 颖 陈永森 陈亚攀

华红莲 刘树芬 孙 俊 朱海燕 伊继东

杨 昆 何朝华 张谦舵 张国儒 芦俊佳

明庆忠 武友德 罗明东 周本贞 骆华松

赵红梅 赵健霞 姚 辉 施 玉 起国庆

赵兴国 彭艳梅 赫维人 蔡红燕 潘玉君

学术秘书 孙 俊 赵健霞 刘树芬

##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一

人文地理学是一门以地域为单元，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经过长期的探索，人们认识到它的核心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向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把客观存在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整体加以优化和调控的可能途径和对策，其目的是为了谋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古代在很多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作品中包含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论述，认为人地关系有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这可以看作是人文地理思想的渊源。比较系统的论述则见诸历代的正史中的地理志、各类地方志和游记中，涉及面广，但零星而分散，又和其他学问交错在一起，因而古代人文地理学的个性是不明确的，只是知识和资料的积累过程。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近代人文地理学才随着其他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外国学者、传教士和我国派往欧美的留学生而陆续引进。此后在大学中设置地理系，成立地理学会，并建立了专业的地理研究所，广泛开展近代人文地理学的讲授和调查研究，但限于经费，工作规模小，出版成果少。

新中国成立后，地理工作者得到了良好的工作条件，配合各项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但在初期的十多年中，国内各项工作都向原苏联学习，我国地理学基本上也按原苏联的模式来发展，引进了不少苏联地理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农业区划、经济区划、地域生产综合体等，加快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现代化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即三四十年代苏联地理界在当时左的政治干预下，把人文地理学当作唯心主义“伪科学”加以全盘否定，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人文地理学的观点也引入了我国，致使我国人文地理学中一度出现经济地理学“一花独放”，而其他一些分支学科被视为禁区的极不平衡的状态。同时苏联地理学强调发展二元论，把它肢解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门属性不同、互不联系的学科，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大转变，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使人们敢于从教条的、空洞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重新评估和认识人文地理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和人文现象的地域差异性大，加以历史悠久而变化大，近年又处于改革阶段，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这就为人文地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发展人文地理具有天赋的优越条件。1980年初，中国地理学会因势利导，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号召，并相应地成立了专业委员会来组织、推动、交流人文地理研究。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也决定在各大学地理系中开设人文地理课程，个别大学还成立了专业的人文地理研究所，出版《人文地理》学术期刊，很多富有才华的中青年地理工作者踊跃投入到人文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原先被冷落的一些人文地理分支学

科，现在已成为热门；原先被视为禁区的一些分支，现在有人敢于钻研；至今尚无人问津的一些新学科，也有人开始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文地理学确实已走上复兴创新的道路。

今后的发展，总的目标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这就要求联系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实际，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的一些具有明显地域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问题，主题是协调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要求通过多方面的大量实践，逐步总结我国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配合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各项人文地理研究工作取得的有效经验，系统建立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已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生前曾主张要从五个方面来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即：一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科学家；二要有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三要应用具有本门科学特点的方法；四要在为国民经济服务中发挥非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作用；五要有大量本门学科的成果资料的积累。这五方面的尺度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成果出版发行的数量和质量显然是最具体的衡量。

为了系统展示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成就，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科学出版社合作，计划组织人文地理学界合力编写一整套《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包括人文地理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争取于近几年内陆续出版。这在学术上无疑是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总结，还可以和 80 年代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相匹配，完善对中国地理的研究。甚望通过《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的出版，把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传钧

1998 年中秋

##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

新世纪迤降，纪元晋双千，地理学发展迈入多元多维结构的全信息化时代。向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既表征地理学研究意义的重大，又展示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强大生命力。

若把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5与16世纪之交航海引起的地理大发现，视为地理研究空间的大拓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激发了推动力，从而导致近代地理学的萌发，那么500年后的今天，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历史时期，航天地理学应运而生，“人地关系”进一步演变“人字关系”，可以预见21世纪中期，将会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效应。人类的“天地生人巨系统”观会赋予地理科学研究全新的内涵，无论是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将推动地理科学产生巨大的变革，不过人地关系仍将是研究的基础。

人文地理学是以研究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及其变化规律和地域分异系统为基本宗旨。作为世界上最高智能动物群体的人类，从其诞生之时，就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人类的繁衍与发展既受人类社会形态与结构的支配，也受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有的学者把地理演化划史分为天文时期、地文时期和人文时期，而人文地理学则是研究人文时期的人地系统，亦即研究各种人文现象的形成、演化、地域分异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人地关系论（man-nature relationship）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在古典地理著作中便有所述。《山海经》、《尚书·禹贡》是先秦时期我国古典地理学发轫期的杰出代表作。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中，对人地关系先后产生了早期的环境决定论、人定胜天论、天人相关论以及因地制宜等不同流派。尽管后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乃至唐代刘禹锡主张人地相关论等，对人文地理学发展都有重要的贡献。但是在我国，因为长期受封建社会的束缚，从而阻碍了人文地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近代科学。

近代人文地理学萌生于西方国家。德国地理学大师李特尔（Karl Ritter）堪称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者，他最早阐述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和统一性，主张地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应从观察出发，而不能从观念和假设出发，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人的地表空间，认识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他在《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这一著作中，探讨了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嗣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定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同时，又主张由于人类因素，地理环境控制是有限的，并把位置、空间和界限作为支配人类分布和迁移的三组地理因素。其代表作《人类地理学》（1882，1891）、《政治地理学》（1897）、《生存空间：生物地理学》（1901）、《民族学》（1885，

1886, 1888)、《地球与生命: 比较地理学》(1901, 1902)等, 对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他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所有对人文地理有贡献者中最伟大的一位”。

19世纪后半期德、英、法、美、俄等国学者在阐述人地关系时, 先后出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以 F. 拉采尔、E. 森普尔 (Ellen Churchill Semple)、E. 亨丁顿 (Ellsworth Huntington) 为代表; “二元论”(dualism)——以 O. 佩舍尔 (Oscar Peschel)、F. 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和 A. 彭克 (Albrecht Penck) 为代表; “或然论”(possibilism)——以 P. 维达尔·白兰士 (Paul Vidal de la Blache)、白吕纳 (Jean Brunhes)、G. 弗勒 (Herbert G. Fleur) 为代表; “适应论”(adaptablism)——以 P. 罗士培 (Percy Maude Roxby) 为代表; “文化景观论”(cultural landscape theory)——以 O. 施吕特尔 (Otto Schluter)、S. 帕萨尔格 (Siegfried Passarge) 和 C. 索尔 (Carl Owtwin Saure) 为代表; “协调论”(adjustablism) 又称“和谐论”(harmony)——以 B. A. 阿奴钦 (Всеволо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учин)、M. 怀斯 (Michael John Wise) 为代表。这些学术流派先后传播到中国, 对近代人文地理学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 自 16 世纪以来, 西方列强殖民地不断扩大, 伴随这种扩展, 一批批传教士来华, 也带来不少的地理知识。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人利玛窦 (Matteo Riui, 1552~1601)、艾儒略 (Julius Aleni, 1582~1649)、龙华民 (Nicolaus Longobardi, 1559~1654), 比利时人南怀仁 (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88), 法国人白晋 (Joach Bouvet, 1656~1720)、杜德美 (Petrus Jartoux, 1668~1720)、蒋友仁 (Michael Benoist, 1715~1774) 等。19 世纪以来还有不少西方学者来华考察, 对中国地学 (包括人文地理) 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有: 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斯文·赫定 (Sven Anders Hedin, 1866~1952)、葛利普 (Amadeus William Graban, 1870~1946) 与德日进 (Teilard de Chardin Pierre, 1882~1955) 等。

20 世纪以来, 中国地理学家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人文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其中自然会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竺可桢先生作为中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 既是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奠基者, 同时又是开拓人文地理研究的先驱。他的《地理与文化之关系》(1916)、《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1922)、《天时与战争之影响》(1923)、《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1926), 是竺老早年对人地关系之论述。丁文江先生的《关于中国人文地理》(1923), 张其昀先生的《中国人之传统》(1926)、《人地学论丛》(1932)、《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1935)、《论中国之人地关系》(1947), 翁文灏先生的《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之意》(1929) 和《中国人口之分布与土地利用》(1932), 胡焕庸先生的《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1934)、《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安徽之人口密度与农业的区域》(1934), 黄国璋先生的《政治地理学研究》(1941), 李旭旦先生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1942), 王成祖先生的《人生地理学的派别问题》(1941), 周立三先生的《农业地理》(1942), 吴传钧先生的《中国粮食地理》(1942), 陈尔寿先生的《重庆都市地理》(1943), 任美镔先生的《建设地理新论》(1946) 等等, 对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学建设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再以刊物为例,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前身——中国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季刊, 1942~1949 年共出 6 卷, 发表论文 136 篇, 其中人文地理学论文即有 56 篇, 若

把地理学通论、地理学思想史、区域地理、外国地理、地理教育等论文计入，则人文地理理论文居于绝对优势，这种格局和国外地理学发展状况一致。

中国学者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学名著方面也做了不懈的努力。30年代初王海初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等所著《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30年代中任美镛、李旭旦先生翻译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La Géographie Humaine*)，陈健民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所著《地理环境之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葛绥成先生翻译澳大利亚地理学家泰勒(Griffith Taylor)的《环境与人》(*Environment and Race*) (也译为《人种地理学》)等，在近代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上起过不同的作用，特别是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所提出的人类在地球表面所做的事按三纲六目人地学基本事实来阐述，并指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也可以影响地理环境，影响程度随科技水平而异。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与作用是相互的，而人类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在中国影响十分深刻。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造就“一边倒”和“学习苏联”的大气候，在地理学界，尽管对推动现代中国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功不可没，可是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是一场劫难。某些人把苏联30~40年代非常时期的学派之争，生搬硬拉强加于中国地理学界，且无限上纲，恣意扩大，以致把人文地理学赶出学术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历史悲剧。

记得1955年正当批判人文地理学高潮迭起之际，我在大学的一门必修课，称作“人文地理学批判”，它不是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某种学术观点、思想和流派，而是批判这门学科，并给予全盘否定，满篇都是政治大帽子，诸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为帝国主义服务”、“伪科学”等等，给当时青年学子们纯洁的心目中，造成了“人文地理学”与“恶魔化形象”等同的极坏影响。这样，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大地上便无立锥之地，被逐出地理学界。那时老师授课无讲义，更无教科书（也许奉命而教，违心讲授），我的笔录较详，还被一位报考留苏同窗借去参阅。嗣后我赴莫斯科大学学习，并没有感受到像国内那样剑拔弩张的学术氛围。实际上，当时苏联地理界已在起变化，随即出版的《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导致苏联统一地理学的复兴，出现了地理学的生态化，经济地理学的社会化，并以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名义在苏联恢复了人文地理学。

极“左”思潮在地理学界某些人群中泛滥，造就一些专门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学术新贵”，直到中苏关系破裂若干年后还在肆虐，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践踏和蹂躏。“文化大革命”中连经济地理学也不复存在，研究队伍被迫改行。

1979年底至1980年初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堪称现代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里程碑！300多位地理学家出席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收到900多篇论文。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李旭旦先生的《人地关系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和吴传钧先生的《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又名《地理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今后任务》)，揭开了我国复兴人文地理的序幕，迎来了人文地理学的春天！

李旭旦先生在报告中指出：“30年来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各个部门都得到长足进展，但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则仅仅是一花独放，这个局面似应有所改变”。李先生进一步阐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民族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

社会地理、疾病地理等，近年西方国家还出现感应地理、行为地理学科，内容极为丰富。人类除经济生活外还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文娱生活等方面。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也不限于生产配置，还存在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问题。因此，仅仅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旨的经济地理学虽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是不足以概括人文地理学的全貌”。因此，李先生疾呼：“应该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这决不意味着要恢复20世纪初期西方各国的各种人文地理学派，也不在于全盘照搬现今流行于西方的以福利为出发点的人生地理学，而是主张参考现代人生地理学的革新方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一门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其内容应在正确的人地相关论基础上，分析研究如何按照自然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因地制宜地使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而不受自然惩罚，把自然环境引向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向，研究在不同民族和文化区内的有关人文地理理论等。”

如果说在复兴人文地理学中，李旭旦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那么，吴传钧先生则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组织家和实践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吴先生主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工作（20世纪80年代扩展为经济地理研究所），则在经济地理的大旗下，掩护发展了人文地理学的主要领域，除了工业地理、农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外，还有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历史地理、世界地理等，一个研究室竟有近60名研究人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吴传钧先生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地理学研究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重点在于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落实到地区综合发展基础上，探求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行为与调控机理。其主要内容有：①人地关系的形成过程、结构和发展趋向的理论；②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强度的分析、潜力估算、后效评价与风险分析；③两大关系间相互作用和物质传递与转换的机理、功能、结构和整体调整的途径与对策；④地域的人口承载力分析；⑤根据一定地域人地系统的动态仿真模型以及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结构潜力，预测特定的地域系统演变趋势；⑥地域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析；⑦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各种类型地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从而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目标与研究方法，使人文地理研究得以升华。

我清晰地记得，李旭旦先生做完学术报告后，1980年元旦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郭敬辉先生召开敬老座谈会，出席会议的12位70岁以上的老地理学家（如今大多作古）中，有不少多年没有参加过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席广州盛会激动不已，座谈时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董绍良先生说：“我20年代就接触人地相关论，这次会议上听大家谈人文地理学，我真像遇到久别的老友一样，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为了繁荣人文地理学而勇于创新”。

然而就在会后不久，有着失落感在“文革”中又自命为“红线代表”的某位以批判他人出名的人物，在座谈会上做了肤浅应景式检讨和言不由衷的道歉后，竟又炮制新的“批判”大作，罗织罪名，妄图把复兴人文地理之举，当做“回流”、“复辟”、“新动向”，再度置人于死地，李旭旦先生首当其冲。《西北师范学院院刊》把李先生的复兴人文地理学的论文和“批判”文章同时刊登，更增添了对他的压力。在这种形式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委托李旭旦和吴传钧先生担任人文地理学分册主编，1981

年冬在上海举行大百科条目研讨会，李先生忧心忡忡，此时，吴先生劝慰：“难道您还怕戴第二次帽子？时代不同了，不必理那一套！”

1982年2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人文地理的重要讲话，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特别把人文地理学列为要加强的薄弱学科之一，从最高层次支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使一度对人文地理持否定态度的“批判家”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

为了适应人文地理学新发展，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1年5月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杭州会议决定成立人文地理研究筹备组，推举8位学者为成员，李旭旦先生任组长；1983年5月在南宁举行首次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吴传钧先生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研究组，李旭旦先生为组长。198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专业委员会会议。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4年7月教育部高教司和中国地理学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人文地理讲习班，加速培养高校人文地理师资。之后中国地理学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教育学院又举办了几期人文地理师资培训班，使人文地理师资培训和科学普及成为全国性的活动。李旭旦先生作为首任专业委员会主任抱病参加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会议，作了“如何进一步开展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讲话。李先生强调复兴人文地理学不是复旧，要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准则，走正路，技术手段必须创新，论题内容要创新，要采取实地考察与社会调查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向人文地理学领域的薄弱环节进军……李先生因病没能出席人文地理讲习班，但他仍以教育家的智慧和极大的注意力关注这项活动。在张文奎、邬翊光、郭来喜协助下，他主编了《人文地理论丛》、《人文地理概说》两本论文集。

李旭旦先生的仙逝，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为之奋斗的未竟事业，在吴传钧先生的直接领导下，有鲍觉民、张文奎先生主持的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做了不懈的努力，使人文地理学研究在教育得以蓬勃发展，学科理论建设和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更上一层楼。鲍、张两先生的辞世，又一次使人文地理学界蒙受损失！

综观近14年来，我国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85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在西安举办的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在无锡召开的中英日城市地理学研讨会；1987年12月在深圳举行的人文地理学研讨会；1990年8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地理联合会亚太会议；1990年11月与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在上海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1993年5月与沿海开放研究分会在昆明共同举办的沿海沿边开放学术研讨会；1996年11月与自然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郑州联合举办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1997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的人文地理学与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1998年4月在北京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地理学与21世纪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从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分立出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并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还成立了全国高校人文地理教育与研究会，也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使人文地理教学与研究空前活跃，人文地理已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列入全国高校的必修课，有的大学把人文地理学建成了重点专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并列，设置了博士点、硕士点。

近10年来先后出版了《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文集》（中英文版，1998）、《人文

地理研究》(1989)、《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1997)等会议文集,吴传钧先生主编出版一套《人文地理学丛书》,创办了《人文地理》杂志(原名为《国外人文地理》)。一些学者还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专著,如《中国人文地理》、《现代人文地理》、《理论人文地理》、《人文地理概念》、《人文地理学》,以及多版本的《人文地理词典》等,还有更多的分支学科专著先后出版。一大批青年人文地理学家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研究与教学的中坚,使中国人文地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特别是以人地系统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共同关心而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学科和核心地位更凸显出来。

钱学森先生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史出发,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时,明确指出以研究地球表层为对象的地理科学的内容与方法。他高瞻远瞩的指明:“地理科学是一门学科体系,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十大部门之一,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地理系统是开放复杂的巨系统”,要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来研究。地理工作者要树立“地理哲学”思想,从事“地理建设”,从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来建设“地理科学”。黄秉维先生认为,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地理科学不等于地理学,而是在若干科学基础上的改造、重组和发展”。

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要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充分运用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成果,从区域解释性描述和地理数据图表简式表述,向全球与区域的监测、规划、设计、调控、优化方向过渡,实现不同尺度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逐步达到钱学森先生所期盼的“地理建设”和“地理科学”的前瞻性设想。

鉴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自然地理》(丛书),集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30 多年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自然地理学及各主要分支学科方面的成就,如今编辑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既是体现完整的中国地理学、全面评估中国地理建设成就的需要,也是为着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实现中国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所必需。

自 1992 年酝酿、策划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以来,先后在北京、昆明做了多次协商,又于 1996,1997,1998 年分别在开封、西安和北京召开三次丛书编辑委员会,集中讨论了丛书编辑的宗旨、书目、纲要、体例、结构、分工和进度,确立了精而准、系列化、中国化的撰稿原则。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多位专家及其代表,一致表示争取在 1999 年完成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迎接 21 世纪来临的献礼。

借此良机,我谨代表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丛书编辑委员会,向为发展中国人地理学做出贡献,参加丛书编辑出版,以及支持和赞助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1998 年 4 月 22 日于北京中关村

# 前 言

物以类聚和物以类分这一普遍法则同样支配着人及其群体。当种族、语言、地域、生活、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的统一性成为聚分的决定性因素时，无数具有一定共性的“个体”的人便形成了不同的“类群”，不同类群之间便有了一定程度的质的区别。当种族共同性、地域共同性、语言共同性和经济生活共同性的综合作用深远地影响到“类群”的人的时候，“类群”的人便形成了民族及其支系。民族及其支系也因此成为反映人的类群之间差别的最重要的称谓性标志或标准。随着科学技术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共同地域和传统意义上的共同语言的同一性的作用将不断减弱。当这种作用减弱到一定程度时，民族及其分支也将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阶层，阶层将成为比民族及其分支更为重要的人的类群划分标准。因此，民族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

对于民族这一“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的研究，形成了关于民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了关于民族的知识——民族的常识知识、民族的宗教知识、民族的神话知识、民族的伦理知识、民族的科学知识和民族的哲学知识。其中，关于民族的科学知识和民族的哲学知识是关于民族的理论知识。民族的理论知识世界是关于民族的世界Ⅲ——波谱尔将世界划分为世界Ⅰ、Ⅱ、Ⅲ——并遵循着客观知识生产的简单模式和基本模式不断生产出新的民族理论知识。这些民族知识既是整体性的又是学科性的。关于民族理论知识的学科主要有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而民族地理的理论知识则是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的知识世界。

作为地理学与民族学之间交叉学科的民族地理学，既属于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又属于民族学，是民族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同时，它作为部门人文地理学，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宗教学、心理学和生态学以及经济学特别是区域经济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有密切联系。民族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主要分支学科，其发展态势可以从学科“外史”或“内史”来看待：第一，从“外史”论看，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与其母体——地理学发展一致的发展过程，即古代民族地理朦胧探索阶段、近代民族地理学实证探索阶段和现代民族地理实证研究阶段，今后将进入后现代民族地理学科范式构建阶段；第二，从“内史”论看，其发展大致经历了民族地理“地方性常识知识”探索阶段、民族地理“地方性科学知识”积累阶段和民族地理“一般性科学知识”探索阶段，现在正处于亟待开展包括研究范式在内的学科范式的构建与完善阶段。我国是世界上民族及其聚居区种类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蕴涵着丰富的民族地理资源，是民族地理学学科范式构建和完善这一创新领域的重要地区之一。这种构建与完善，应当遵循“历史与逻辑同一性”原则进行。

古老而年轻的民族地理学，至今始终面临着“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等问题，尚没有形成学术界的共同答案的局面。为什么要追寻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原因是，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是这门学科的最根本问题，是因为它的内容、它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它的社会功能等等都是由它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它的研究对象是否明确,直接决定着它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决定着它的科学性的含量。众所周知,对于学科研究对象的最一般认识、哲学认识和科学实践认识,是回答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乃至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重要理论基础。《现代汉语词典》最一般地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解释:研究对象“是指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阐述了研究对象问题:“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学科的对象”。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院士从科学哲学层面和科学实践层面,在《论地理科学》中更加精辟地阐述了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他论述道:“各个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都是客观实际,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它们研究的角度不同,研究的侧面有所不同。”作为人文地理学主要分支学科的民族地理学,遵循演绎即由一般到具体和特殊的逻辑思路,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核心是地理学研究对象——地球陆地表层空间系统与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具体化。所以,研究对象的矛盾特殊性、研究角度的独特性和研究侧面的选择性等,是回答民族地理学研究对象这个问题的方法论。由此归纳,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陆地表层的民族空间系统,研究核心是民族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民族地理学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从科学哲学和知识论看,民族地理学的知识系统中,应该包括典型的民族地理事物、典型的民族地理问题、民族地理科学概念、民族地理规律、民族地理假设、民族地理学说和假说、民族地理知识体系等基本的知识形态。目前,这些应该有的民族地理知识形态,多数还处于潜知识阶段,需要民族地理工作者遵循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和知识论以及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构建。构建的路径应该是自上而下的演绎和自下而上的归纳的统一。民族地理学的知识体系形态的基本知识,是通过学科体系来反映的。关于民族地理学的学科体系,迄今尚缺少基于地理学学科的研究和成果。民族学和人类学关于民族地理学的学科位置和学科体系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着眼于地理学,在民族地理学中,应该包括的分支学科有:理论民族地理学、应用民族地理学和区域民族地理。其中,第一,理论民族地理学要回答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核心、民族地理概念系统、研究方法论等诸多民族地理本体问题、认识问题和方法问题以及知识问题。第二,应用民族地理学要回答如何将理论民族地理学理论知识应用到区域民族地理(实践)的路径问题、如何将区域民族地理实证研究特别是个案研究成果理论化为理论民族地理学知识的路径问题、民族地理信息系统和地图以及地理考察、统计处理等研究方法。第三,区域民族地理应该包括区域历史民族地理和区域现代民族地理,它们均包括世界民族地理、大洲民族地理、国家民族地理、省域民族地理和市域民族地理等不同区域尺度的民族地理。中国民族地理属于区域民族地理中的国家民族地理,既包括历史成分又包括现代成分。作为民族地理学及其分支的中国民族地理,是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中迄今研究得最为薄弱的分支学科之一。然而她对于区域科学发展将会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为此,民族地理学的思想、理论、方法和学科以及服务社会经济问题等,亟待研究与发展。

如何发展民族地理学,已成为地理学学科发展内在要求和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民族、世居少数民族、跨境少数民族、未识别族群、少数民

族聚居地、少数民族起源地和少数民族分支最多、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蕴涵着丰富的区域民族地理资源，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开展民族地理区域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天然试验室。我们认为，从理论最高目标上看，《中国民族地理》应该回答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人种基础、自然地理基础、人文地理基础、民族起源和发展时空结构、地理观念、要素结构（包括聚居地和散居地在内的地域结构）、海外华人华侨、民族地区人地关系和民族地理分区等问题。我们在对民族地理的探索和思考中，逐渐形成了应该遵循“地理研究综合范式理论”（详见《地理科学导论》，潘玉君、武友德，科学出版社，2005），去研究和撰写《中国民族地理》的观念、理论和原则。

这部《中国民族地理》从缘起到构思，再到设计、撰写和出版，是与老一辈科学家的关怀、期望、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我理性地关注民族地理学是新千年开始的时候。新千年伊始，我被引进到云南工作。在赴滇途中，我专程到家中拜访曾给予我许多关怀、教导的吴传钧先生和瞿宁淑先生。吴先生和瞿先生反复强调和鼓励我，到了云南后可以充分利用云南多民族的区域条件系统研究云南民族地理和中国民族地理，民族地理学需要发展。来到云南后，我开始探索民族地理，幻想将来能写一本民族地理方面的书，并开始构思中国民族地理。后来在郭来喜、王恩涌、吴三保和张国友等先生的关怀和帮助下，我有幸加入了国家“九五”重点图书项目——《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的撰写队伍，并承担和主编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之一的《中国民族地理》。这些年来，我的主要学术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和撰写《中国民族地理》。

本书正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论述了中国民族地理问题。全书分为8篇，67章，附录4个。第一篇，中华民族的人种结构和民族发展，含1~3章：论述了中华民族的人种特征、中华民族起源与发展的时空格局、中华民族的自觉发展。第二篇，民族地理基础与民族空间格局，含4~7章：论及中华民族的历史地理基础、民族的理论地理基础、民族构成与分布格局、民族分布聚居格局。第三篇，人口较多且分布较广民族地理，含8~21章：分别阐述了汉族、回族、藏族、彝族、苗族、满族、壮族、蒙古族、畲族、维吾尔族、瑶族、土家族、朝鲜族、布依族14个民族的民族地理。第四篇，人口较多而分布较狭民族地理，含22~34章：分别阐述了哈萨克族、侗族、傣族、白族、傈僳族、黎族、哈尼族、仡佬族、佤族、拉祜族、东乡族、水族、纳西族13个民族的民族地理。第五篇，人口较少而分布较广民族地理，含35~48章：分别阐述了高山族、锡伯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乌孜别克族、土族、鄂温克族、布朗族、柯尔克孜族、羌族、景颇族14个民族的民族地理。第六篇，人口较少且分布较狭民族地理，含49~63章：阐述了阿昌族、普米族、德昂族、佤族、毛南族、珞巴族、撒拉族、怒族、京族、塔吉克族、独龙族、裕固族、门巴族、保安族、基诺族15个民族的民族地理。第七篇，华侨华人和跨界民族地理，含64~65章：阐述了华侨华人地理和跨界民族地理。第八篇，民族地理分区与民族地区发展，含66~67章：探讨了民族地理分区和民族地区科学发展。附录包括中国的语言系属表、中国民族主要术语译名、濒危语言和中国的跨界民族。

中国民族地理研究和《中国民族地理》撰写是一项任务很重的工作。这项工作在吴传钧、郭来喜、王恩涌、吴三保、张国友等多位先生的系统指导下，我们不断修改和完

善研究框架和撰写提纲，数易其稿，从原来 200 余万字逐渐压缩到现在的篇幅。全书结构框架、撰写规范和写作要求由潘玉君等诸位主编、副主编商量后设计，并由潘玉君对各篇章提出编撰要求和具体修改意见，以及对有关部分书稿作了修改重写，最后孙俊协助统稿。

各章主要作者是：第一章潘玉君、孙俊、肖翔，第二章潘玉君、孙俊、韩兴粉，第三章孙俊、潘玉君、李会仙，第四章孙俊、潘玉君、华红莲，第五章姚辉、潘玉君、杨小燕，第六章姚辉、潘玉君、张谦舵、王未，第七章高庆彦、潘玉君、赵健霞，第八章孙俊、潘玉君、郭泱泽，第九章孙俊、潘玉君、徐娟，第十章常楠静、潘玉君、杜莹，第十一章常楠静、潘玉君、聂玉梅，第十二章孙俊、潘玉君、余祖亮，第十三章姚辉、潘玉君、郭泱泽，第十四章张谦舵、潘玉君、潘永平，第十五章常楠静、潘玉君、白帅，第十六章赵健霞、潘玉君、霍冬梅，第十七章杨静思、潘玉君、杜莹，第十八章赵健霞、潘玉君、徐娟，第十九章杜青、潘玉君、常楠静，第二十章潘玉君、杨静思，第二十一章杜莹、潘玉君、丁生，第二十二章郭泱泽、潘玉君、李振南，第二十三章杨静思、潘玉君、陈锡才，第二十四章聂玉梅、潘玉君、王胜德、潘建楠，第二十五章赵健霞、潘玉君、周兵，第二十六章赵健霞、潘玉君、赵兴国，第二十七章杜莹、潘玉君，第二十八章白帅、潘玉君、马前涛，第二十九章刘海琴、潘玉君，第三十章赵健霞、潘玉君、杜莹，第三十一章潘玉君、王小玲，第三十二章赵健霞、潘玉君、郭泱泽，第三十三章姚辉、潘玉君、方杏村，第三十四章崔文芳、潘玉君、丁生，第三十五章刘海琴、潘玉君、尚海龙，第三十六章杜斌、潘玉君、常楠静，第三十七章李会仙、潘玉君、张明军，第三十八章刘树芬、潘玉君，第三十九章华红莲、潘玉君、赵健霞，第四十章杜莹、潘玉君，第四十一章柳德江、潘玉君、刘树芬，第四十二章杜青、潘玉君、周兵，第四十三章华红莲、潘玉君、马前涛、杨磊，第四十四章杨小燕、潘玉君、杜青，第四十五章高庆彦、潘玉君、方杏村，第四十六章苏东辉、潘玉君，第四十七章孙俊、潘玉君、王小玲，第四十八章肖翔、潘玉君、施玉，第四十九章杨小燕、潘玉君、华红莲，第五十章张谦舵、潘玉君、赵健霞，第五十一章王文静、潘玉君、崔文芳，第五十二章王小玲、潘玉君、王文静，第五十三章陈锡才、潘玉君、周兵、牛爱啟，第五十四章马前涛、潘玉君、陈锡才，第五十五章孙俊、潘玉君、王斌，第五十六章周兵、潘玉君、赵兴国，第五十七章丁生、潘玉君、施玉，第五十八章潘玉君、杨小燕、高庆彦，第五十九章方杏村、潘玉君、聂玉梅，第六十章段如婷、潘玉君、马前涛，第六十一章刘树芬、潘玉君，第六十二章丁生、潘玉君、杜青，第六十三章孙俊、潘玉君、白帅，第六十四章尚海龙、潘玉君、孙俊、李春娟，第六十五章赵兴国、潘玉君，第六十六章姚辉、潘玉君，第六十七章施玉、潘玉君、赵兴国，附录孙俊、潘玉君、郭泱泽。此外，孙俊在各民族基本特征和历史渊源以及协助统稿方面，姚辉在协助地图编辑方面，杜莹、杜青和刘海琴在民族分支和未识别族群以及整理章末参考文献方面，白帅、尚海龙和杨静思在民族世居地、聚居区方面，郭映泽和杜斌在民族语言文字和部分地图编制方面，高庆彦和聂玉梅在民族起源和民族走廊方面，赵健霞和刘树芬在各民族第二节修改和更新数据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和瑞芳、赵祖平、陈旭、娄昭等参加了部分环节的工作。

拙著是国内外第一部从地理学角度系统阐述中国民族地理的学术著作，对于科学认